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

大家好！2021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诠释了人间大爱，用众志成城、坚忍不拔书写了抗疫史诗。在共克时艰的日子里，有逆行出征的豪迈，有顽强不屈的坚守，有患难与共的担当，有英勇无畏的牺牲，有守望相助的感动。从白衣天使到人民子弟兵，从科研人员到社区工作者，从志愿者到工程建设者，从古稀老人到“90后”、“00后”青年一代，无数人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构筑起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一个个义无反顾的身影，一次次心手相连的接力，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生动展示了伟大抗疫精神。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向所有不幸感染的病患者表示慰问！向所有平凡的英雄致敬！我为伟大的祖国和人民而骄傲，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自豪！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我们克服疫情影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擘画。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我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粮食生产喜获“十七连丰”。“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奋斗者”号等科学探测实现重大突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我们还抵御了严重洪涝灾害，广大军民不畏艰险，同心协力抗洪救灾，努力把损失降到了最低。我到13个省区市考察时欣喜看到，大家认真细致落实防疫措施，争分夺秒复工复产，全力以赴创新创造，神州大地自信自强、充满韧劲，一派只争朝夕、生机勃勃的景象。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总攻，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历经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些年，我去了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亲们愚公移山的干劲，广大扶贫干部倾情投入的奉献，时常浮现在脑海。我们还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

今年，我们隆重庆祝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置身春潮涌动的南海之滨、绚丽多姿的黄浦江畔，令人百感交集，先行先试变成了示范引领，探索创新成为了创新引领。改革开放创造了发展奇迹，今后还要以更大气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经历了一年来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我同国际上新老朋友进行了多次通话，出席了多场“云会议”，谈得最多的就是和衷共济、团结抗疫。疫情防控任重道远。世界各国人民要携起手来，风雨同舟，早日驱散疫情的阴霾，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此时此刻，华灯初上，万家团圆。新年将至，惟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惟愿和顺致祥、幸福美满！谢谢大家！

（习近平）

2021. 1

主办单位：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中共河北省委讲师团

主编：

袁宝东

编辑：

何宪民 王梦茹 李大明
申玲敏 王倩

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
西路 67 号

邮编：050051

电话：0311-83056993

准印证号：(冀 L)1100165

发送范围：

省四大班子领导，省直各单位，各设区市、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党委宣传部，全省党委讲师团系统各单位

承印单位：

石家庄燕赵创新印刷有限公司

印数：2500

印刷时间：1 月 20 日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国经济发展新航向 张德勇 1
深刻把握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袁维海 4

01 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

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 秦宣 7

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起步 陈昌盛 雷潇雨 11

02 高质量发展

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陈江生 14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王东京 16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韩长赋 20

03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张占斌 杜庆昊 23

加强“需求侧管理”的重点和方向 王一鸣 27

04 系统思维

加强系统思维谋划和做好经济工作 马援 刘伟 31

05 重点任务

不断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卫志民 于松浩 34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韩保江 37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新华社评论员 41

以“四个结合”力促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盛朝迅 42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 臧跃茹 44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问题 推动双循环高质量发展

陈杰 45

编者按：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建党100周年的日子，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了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根据国内外发展大势，提出了明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其中，一些新提法、新表述及其工作部署，传递出明确的政策信号，指引中国经济迈向新征程。

会议指出，做好2021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化科技战略支撑，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更好地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们编辑了这期《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专辑》。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国经济发展新航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德勇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经过艰苦努力，我们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

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重要突破，民生得到有力保障。成绩面前，也必须清醒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依

然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特别是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各种风险挑战叠加。因此，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2021年采取富有针对性的举措。

凸显国家重大战略布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强化了经济全球化的逆流，加剧了各国间的战略博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深度重构，科技竞争成为发展的关键变量。科技发展中的某些“卡脖子”问题，对我国发展、国家安全等造成重大影响。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时，首先部署的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这是以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不常见的，凸显了这两项重点任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始终依靠我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会议要求，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经济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针对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发生的变局，

会议从战略高度，强调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要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这种部署，核心在于尽快扭转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为做大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提供有力保障。

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020年受疫情的巨大冲击，全球经济严重衰退；2021年疫情变化仍具不确定性，全球经济依然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下。尽管202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就，但2021年依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因此，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重点是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在宏观政策作用方向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注重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扩大内需，充当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抓手。

扩大内需，要把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摆在突出位置，将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积极发展网络消费、无接触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服务消费等消费新热点，引导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有序发展，大力培育新型消费，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并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投资是内需的重要构成，所以扩大内需，也必须重视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发

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领域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等。通过注重需求侧管理来扩大内需，除向消费与投资直接发力，也应为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所以，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都是扩大内需的必然之举。

需要指出的是，注重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必须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谁也离不开谁而单独存在。所以，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既做好“减法”，也做好“加法”，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发展，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如此，创新供给模式、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既适应需求变化，更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解决当前社会焦点问题

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在交出一份火红的成绩单的同时，也面临某些新的问题，对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产生一定影响。针对这些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时提出举措，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随着科技进步和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出

现了市场资源过度向某些大型平台企业集中的倾向，易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这种垄断，无论从科技创新，还是从市场公平竞争以及消费者权益等方面来说，都暴露出不少风险隐患。因此，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会议提出了具体措施，既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也针对平台企业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加强政策引导与监管，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鼓励平台企业发展出硬核科技，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另外，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与我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都有密切关联。强调种子问题，为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少见。无粮不稳，种子和耕地，事关我国粮食安全，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基。因此，会议把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作为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保障粮食安全，稳定民心、稳定社会。同样，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也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内容。会议在继续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的同时，突出了在租房方面的新举措，比如，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等。这都是很切中现实的及时必要之举，有利于提高民生福祉，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来源：摘自《中国青年报》2021年01月04日)

深刻把握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副校（院）长 袁维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概括了我们党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深化了对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五个方面规律性认识。这些规律性认识，内涵丰富而深刻，揭示了应对风险挑战、做好经济工作的领导核心、价值取向、制度保障、科学方法、实践基础，是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好2021年乃至更长时期经济工作，必须深刻把握“五个根本”的规律性认识，坚持按规律办事来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进而有效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

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这一切成就的取得，最根本的在于党的坚强领导。面对严峻复杂的

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重要突破，民生得到有力保障，这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答卷充分证明，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我国经济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提高领导干部专业化能力，努力成为领导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家里手，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面；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固本之举，发挥好我们党强大的组织资源和组织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各项举措落地生根。

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经过8年持续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得到解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指出，“战胜这次疫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实践一再证明，只要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才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路径，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越是情况复杂、任务繁重，我们越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本。要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聚人心、暖人心、得人心的扎实工作，凝聚起亿万人

民的磅礴伟力。

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实践作出了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一方面，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应对。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资源，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另一方面，制度和治理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这要求我们必须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健全各方面制度，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我们要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基础上，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发挥出攻坚克难、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能量，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

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危和机

总是同生共存的，克服了危就是机。202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战“疫”、战“贫”、战“洪”，努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面对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党中央主动调整发展战略，创造性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不是被迫之举和权宜之计。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了重大工作部署。做好2021年经济工作，必须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来展开，尤其要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通过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只要我们站位全局、立足实际，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因时因势施策，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只要我们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就一定能够在抗击大风险中创造出大机遇，确保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

困难的有力武器。近年来，我国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取得了历史性、整体性、系统性的重大进步，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我国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首先，要明确主攻方向。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功夫。其次，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政府职能，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为创新创造者营造良好环境、搞好相关服务。再次，要抓好科技创新主体。既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更要用好生力军，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只要我们秉持科学精神、把握科学规律、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就一定能够破除各种瓶颈制约，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大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01月13日）

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 秦宣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潮流、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论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科学认识新发展阶段的丰富内涵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包含若干不同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可见，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发展阶段，主要是指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理解。

从现代化维度看，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十四五”时期是这一新发展阶段的开局时期和起始阶段。

从经济发展维度看，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十四五”时期，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归根结底要靠发展、靠高质量发展。与过去的高速发展阶段不同的是，新发展阶段要围绕高质量发展进行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使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更加充分，城乡区域发展更趋平衡，在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从国家治理维度看，新发展阶段是不断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历史任务是紧紧围绕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从民族复兴维度看，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这个阶段是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取得更为实质性进展的阶段，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

辩证看待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机遇挑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一重要判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发展阶段形势任务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为我们党和国家谋划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仍在曲折中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经济版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加速重塑世界；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在加速推进；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世界和平力量在不断增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另一方面，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排外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问题

越来越严重。这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另一方面，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还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这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好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

总体而言，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就要辩证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一方面，增强机遇意识，充分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历史机遇，充分认识改革开放

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为新发展阶段创设的良好条件，在激烈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顺势而为、赢得主动，于变局中开新局；另一方面，增强风险意识，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风险新挑战，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善于迎接挑战、逆势而上，于危机中育新机。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必须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and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以创新理论指引发展。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系统观念推进发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切实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内市场、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发展、文化建设、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社会

建设、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重点领域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新发展阶段全过程和各领域，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的变化，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让创新成为发展基点，拓展发展新空间，创造发展新机遇，打造发展新引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

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充分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靠改革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增强民生福祉，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不断回应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新发展阶段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拥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机遇优势，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完成新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5日）

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起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陈昌盛 雷潇雨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国内外经济形势，提炼总结了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根本遵循。今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稳固经济恢复态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实现“十四五”高质量开局。

经历大考 成就亮眼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压力，党中央果断决策、科学应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施了一系列纾困救助政策，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同时，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可载入史册的重大成就。

总体上看，2020年我国经济经历大考，成就亮眼。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升。虽然2020年一季度GDP出现负增长，但二季度GDP增速已经转正，四季度增速预计能够回到潜在增长水平，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二是主要经济指标普遍改善。

2020年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超过去年同期水平；民间投资增速转正，市场投资信心和计划明显提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0%，内需展现较强韧性；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降为5.2%，城镇新增就业已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三是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推进。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2020年前三季度日均新增市场主体6.7万户，新增企业2.2万户，市场主体数量实现了逆势增长。同时，我们还以开放共赢姿态加强国际合作，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功签署RCEP。特别是依靠国内完整产业链和率先复工复产优势为全球抗疫作出了重要贡献，到目前中国已为全球提供了超过2000亿只口罩。

在这场疫情大考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关键在于党中央的科学正确决策和全国上下有力有效的扎实工作。一是宏观政策方向突出保市场主体、保就业民生，稳住了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盘。企业和困难人群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群体，为此我们及时出台了大力度减税、减免缓社保缴费等一揽子政策，目的就是缓解企业困难和稳岗保就业，既留住青山也守好民生根本。二是创新精准直达机制，提高政策的传导效率和综合效能。我们创新了财政特殊转移支付、精准滴灌的结构性货币政

策等直达工具，在短时间内提高了效率，确保政策效力第一时间到达抗疫救助一线，直接惠企利民。三是强化改革式救助，把解决困难与激发活力结合起来。我们把救助政策与改革创新紧密结合，在助企纾困的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既解决当下困难，又着眼长远激发活力。四是注重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以合理代价实现最大成效。2020年的宏观政策既有应急性纾困举措，也有管长远的制度安排，还为阶段性政策退出预留了空间。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应对疫情冲击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小，货币供应量和政府性债务增速相对温和。五是坚持下好先手棋，厚植宏观政策应对基础。成功应对任何短期意外冲击都离不开过去的长期积累和战略性的主动谋划。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化解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风险挑战，特别是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不断增多壮大，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提高了体制机制适应性，从而增强了应对危机的能力和韧性。

把握大势 抓好重点

辩证地看，2021年我国外部环境危中有机，国内经济恢复将继续向好。从国际看，今年世界经济总体呈现修复性增长态势，但疫情发展和影响仍有很大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恢复进程还有反复的风险。从国内看，今年我国经济将总体向好，延续修复性增长态势，但政策逐步正常化的节奏和力度把握显得十分关键。各大国际机构纷纷看好我国经济，预测我国经济增速将从2020年的2%左右提升至今年的8%左右。具体分析，今年我国经济增速预计较高，但各季度增速差别较大。由于2020年前两季度GDP基数较低，今年对应季度增速可能冲高，全年呈现前高后低、坡度较陡的走势。如果剔

除基数影响因素，今年经济运行可能是相对平稳的过程。今年一季度可能出现两位数高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出现了过热，同样下半年经济增速可能相对放缓，也不意味着经济出现快速下滑。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今年经济可能呈现宏观指标好看、微观感受一般的特点，尤其一季度可能出现两位数增长与居民消费价格小幅通缩并存局面。疫情冲击后我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仍需进一步巩固，市场主体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元气，需要平衡好经济恢复与风险防范的关系，避免出现政策过早退出和“一刀切”问题，切实巩固和维护经济向好态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今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开局之年，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经济运行逐步趋向正常，政策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在操作上更加精准有效，注意把握时度效，做好稳、退、进，保护政策的可持续性，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逐步推动政策回归正常。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政策取向总体稳定，稳妥退出临时性救助政策，优化推进既可持续又长期有利的政策安排，做好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短期和长期、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协调平衡。

继续抓好“六稳”“六保”各项工作，解决关系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突出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激发市场主体内在活力；还要持续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缓解重点人群就业压力，着力保障低收入群体收入平稳。此外，还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

集中力量谋划安全发展大局，破解制约发展的突出阻碍。2020年的疫情冲击和各方面风险挑战让我国长期发展中面临的一些安全隐患暴露了出来，需要我们提早谋划、集中破解。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基础学科、科技创新等方面集中攻关，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此外，还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兜牢国家和人民安全底线。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优化需求侧管理。疫情冲击导致的需求收缩尚未充分恢复，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都需要需求侧支撑，坚持扩大内需是我们推进经济发展的必要选择。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来拉动有效内需，同时也要通过需求侧管理解决市场内生需求不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目前全国共有老旧小区近16万个，如果用几年时间完成改造，年均投资近万亿元，同时还将带动相关消费升级和公共服务改善。要加强产业集群建设，加大企业技改投资支持力度，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时有序引导产业错位发展，避免一哄而上和投资浪费。此外，还要通过优化制度环境，大力促进消费。

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积蓄发展新动力。要用好宝贵的时间窗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要深化“放管服”改

革，放宽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建设统一大市场；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加强促改革和防风险之间的协调平衡，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充分利用自贸区（港）等开放平台，推动制度型开放取得实质性突破。

完善数字经济和绿色领域制度建设，引领中长期发展布局。数字经济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绿色发展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心愿，都是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必由之路。疫情的发生，既推动了数字经济逆势增长，也警示我们要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推动数字经济健康长远发展，既要加强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提升监管能力，完善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把推进绿色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紧迫的位置上，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加快制定出台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主动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此外，还要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大绿色发展领域国际合作，推进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的对话协商和合作共赢。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起步之年，也是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始之年，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各项重要任务，奋力拼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来源：《经济日报》2021年01月04日）

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江生

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提出2021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部署重点任务，为开局“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定向领航。

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会议指出，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陈江生认为，“十四五”时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是一个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为适应人民不断提高的对美好生活的要求，经济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时期；是一个我国在世界格局中实力地位持续增强、外部压力空前增大，亟待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时期；是一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山

雨欲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补齐短板弱项时不我待的时期。对此，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抓住这个关键时期，乘势而上，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纵观世界大势，分析国情国力，“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催生新发展动能、激发新发展活力、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持续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十四五”时期，在“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我国一方面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

国内大循环，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以规避强势贸易进攻或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坚持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有机衔接，统筹兼顾；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双方优势互补、良性互动，以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在“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方面，我国将依托超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备的产业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筑牢基础；“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强基础研究，推出更多涉及民生的科技创新成果，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形成量子科技发展的体系化能力；促进科技资源配置的整合优化，“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加快科技强国建设；重视人才培养，全方位提高教育质量，积极发挥高校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在“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方面，我国将坚定制度自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破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机构职能部门的组织结构，创新行政监管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未

来发展之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进而促使经济发展能够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力量。

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方面，我国将秉持互利共赢理念，“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以弥补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失；畅通对外合作渠道与机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营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环境，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正能量；统筹好开放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以及风险防控能力。在“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方面，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深入践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缩小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不同领域的生产效率差距；“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增添新动力、开创新局面”，“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满足人民对社会建设的希冀。

（来源：人民论坛网 2020 年 12 月 21 日）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东京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时也再次强调，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落实速度换挡、动力转换、创新体制等关键举措，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落实在国家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

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速度换挡

经济增速高低并不反映经济实力的强弱，财富存量也不等同于财富生产力。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不应再纠结 GDP 增速，而应将重点放在提高财富生产力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今年是我国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眼点着力点不能放在 GDP 增速上”。早在 2014 年，他就作出了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判断。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将原来的“高速”调整为“中高速”。

高质量发展为何要求速度换挡？我们可从以下三个角度看：

第一个角度：从增长速度变化的一般规律看。经济增长率 = $(\text{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 \text{上年国内生产总值} - 1) \times 100\%$ 。随着经济总量增加，等式右边分母越来越大，而由于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作用，分子与分母的比率必然下降。比如，当国内生产总值为 10 亿元时，新增加产值 8000 万元，增长率为 8%；而当国内生产总值扩大到 100 亿元时，即便增加 5 亿元产值，增长率也仅为 5%。这是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增速放缓是客观规律。

事实上，西方工业国家的现实已印证了这一点。今天的发达国家皆经历了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农耕时代经济增长慢，进入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明显加快，而到工业化后期，增长速度又放慢了。20 世纪 50 年代，美、日、德、法等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4.2%、8.8%、9.1%、4.8%；而 21 世纪的前 10 年，则分别降至 2.1%、1.5%、2.1%、1.2%。

第二个角度：从增长速度与国家经济实力的关系看。人们通常以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

速度越高，GDP 规模就会越大，国家经济实力也就越强。若仅就当期看，这样讲当然是对的。但要是拿不同时期增长速度作比较，得出上面的判断却是错的。要知道，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其高低并不具有可比性，而且做这种比较很容易给人造成“追求高速度”的误导。请看下面两组数据：1992 年，我国 GDP 总量为 2.7 万亿元，增长率为 14.2%；2019 年，我国 GDP 总量近 100 万亿元，增长率为 6.1%。若论增速，2019 年明显低于 1992 年；可从增加的产值看，1992 年仅增加 3800 亿元，2019 年却增加了近 6 万亿元。可见，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速，与一个国家财富存量（经济实力）并不是一回事。

第三个角度：从财富存量与财富生产力的关系看。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不能将财富生产力与财富存量混为一谈。他说，财富生产力好比果树，财富则是果树结出的果子，财富生产力要比财富存量重要得多。根据李斯特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总产值（GDP）可看作一国的财富存量，而财富的市值，则取决于该国的财富生产力，即财富创造收入的能力。

举个例子：现在甲、乙两人，分别购置了 100 万元的机器。从资产存量看，他们的财富都是 100 万元。可甲的机器每年可创造 10 万元收入，乙的机器每年只创造 4 万元收入。按照资产定价原理：资产价格 = 该资产未来年收入 / 银行年利率。假定年利率为 5%，那么甲的资产市值为 200 万元，乙的资产市值仅为 80 万元。同样是 100 万元的资产存量，可由于财富生产力不同，市值却大不相同。

分析至此，对我们应有三点启示：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客观规律，当一个国家经济

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应再追求高速度；第二，增长速度的快慢并不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所以不必纠结增长速度，也不必拿增长速度作纵向或横向比较；第三，一国财富生产力比财富存量更重要，因此发展经济的重点是提高财富生产力，而不是追求 GDP 数量。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转换动力

受国内资源环境和国际环境变化的约束，高质量发展必须转换动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为此，应加快推进产业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延伸，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前面我们分析，一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要将重点放在提高财富生产力上。问题是怎样提高财富生产力？对此，中央明确提出应转换发展动力。毋庸置疑，在过去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主要靠投资、出口拉动；而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则应主要依靠创新驱动，通过动力变革，推动经济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何要转换动力？我认为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受国内资源环境约束，以往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生产方式已难以为继；二是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抬头，那种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也已难以为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要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转换发展动力。

纵观世界经济史，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事实是：谁占据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成为经济强国。我们知道，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故乡，一战前一直号称“世界工厂”，可到 20 世纪初却被美国赶超；二战后日本迅速崛起，

经济总量超过了德国。美国和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虽多，但归根到底是美国引领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新技术革命；而日本也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具备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看，我们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拥有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有 14 亿人口，人均 GDP 达到了 1 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 4 亿人，规模居全球第一。

可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目前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间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还存在“卡脖子”的问题。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特别是在当前特殊形势下，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产品不仅难以引进，而且以前能引进的现在也变得困难重重，甚至出现了断供。

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而在此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其中第一个就是“创新发展”。邓小平同志也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央高度重视创新，原因是创新在我国高质量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中央强调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

竞争力。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以创新为动力。否则，没有创新作支撑，不仅传统产业无法升级，更不可能建成现代产业体系。

当前我国存在的内需不足问题，主要是供给结构和质量不完全适应需求引起的。有鉴于此，中央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中外实践表明，供给侧一旦实现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由此可见，创新对扩大内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角度看，对我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推动产业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延伸，尽快进入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端环节，主导重构全球创新链、供应链。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应该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的科研攻关，抢占全球技术创新制高点。只有坚持自主创新，让科技自立自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被人“卡脖子”的问题。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创新体制

推动创新应重点打通“两公里”：打通“最先一公里”，政府要改革投资体制，集中财力，加大对基础研究、“杀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投入；打通“最后一公里”，则应完善并落实科技人员收益分享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高质量发展要靠创新驱动，推动创新具体到操作层面，也有两个问题：一是国家应该支持创新，但并非所有创新都要由政府财政投资，那么政府应投资哪些科技项目？二是科技与产业融合才能转化为生产力，那么怎样才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早就讲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在谈

到科技创新与改革的关系时他指出：“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其意思很清楚，科技创新要靠制度创新推动。

困难在于如何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当然要坚持问题导向，就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来说，最突出的问题是财政投入过于分散。无需政府投资的项目，财政投了不少；而应该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却又投入不足。这种局面亟待改变，要及早从制度上明确：今后哪类创新项目由财政投资；哪类创新项目应该面向市场筹资。

根据中国的实际，政府投资创新应重点打通“最先一公里”，即核心技术创新。所谓核心技术，是指基础理论研究、“杀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等。对政府重点投资核心技术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些领域，我们同国外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能够超前部署、集中攻关，很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政府之所以要投资核心技术创新，从经济学角度讲，因为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核心技术成果就是公共品。比如基础理论研究，其成果显然不同于应用技术成果。应用技术成果是商品，可以有偿转让；而基础理论成果却不能成为商品，也不能通过市场取得回报。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举世公认的伟大发现，可是有谁会花钱去买“进化论”呢？

“杀手锏”技术虽不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可此类技术研发事关国家公共安全，而且不以营利为目标，这就决定了此类技术创新成果也具有公共品属性；而颠覆性技术创新一旦成功，不仅可推动国内产业实现颠覆性升级，而且能整体提升国家竞争力。然而此类创新投资大、

风险也大，所以需要国家投资支持。

再看科技成果转化。我国技术专利数已连续多年居全球之首，可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6%。针对此现状，我们必须打通“最后一公里”，拆除阻碍产业化的“篱笆墙”，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

1980年前，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也不高。当时美国法律规定：联邦政府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归联邦政府所有；专利权转让收益也归联邦政府。在这种制度下，美国专利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也非常低。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将专利权下放给了研发机构，于是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一路飙升，今天达到50%以上。可见，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人员的利益相关。

2007年，我国修订了科技进步法，将专利权也下放给了科研院所；2015年又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对完成、转化该项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可以说，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制度已经确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关键是要将利益分享机制落实到位，从而以更好的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进而带动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源：《经济日报》2021年01月04日）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韩长赋

中央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这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作出的战略部署。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把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摆上突出位置，推动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是农业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十三五”时期，我们着力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农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粮食生产实现历史性的“十六连丰”，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棉果菜茶肉蛋鱼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新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主要农作物实现良种全覆盖，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0%。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新成效，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67.5%，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化肥农药施用量连续3年负增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适度规模经营实现新发展，全国家庭农场超过100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220万家，

农村承包地流转占全国农村承包耕地面积的35.9%。农民收入实现新突破，提前一年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连续4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农业连年丰产丰收，14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增加了主动，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添了底气，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基础支撑。特别是面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严重自然灾害影响，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粮食再获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继续稳定在1.3万亿斤水平上，“菜篮子”产品量足价稳，农业压舱石愈发稳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严重，但我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

进入“十四五”，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要着力解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重点从农产品结构、抗风险能力、农业现代化水平上发力。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高的问题突出起来。我国农业仍是大而不强、多而不优，基础还不稳固，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较差；市场化组织化

程度不高，产业链条短，全产业链收益低，国际竞争力不强；农产品结构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质量安全风险隐患依然存在；资源环境要素约束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任务仍然艰巨。解决这些瓶颈问题，要统筹考虑农产品产量、绿色发展和农民收益，更加注重能力提升、强基固本，绿色安全、适销对路，科技创新、节本增效，推动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实现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适应确保国计民生要求，把农业现代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优先任务，将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摆上更加突出位置，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持续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全面提升农业规模化、科技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标准化水平，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提高全产业链收益，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基础支撑。

全面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改善提升农机装备、农田水利

和仓储物流等设施条件，增强综合生产能力。着力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健全激励性利益补偿机制，保护主产区和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全面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稳定生猪基础产能，保障粮、棉、油、糖、肉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完善中央储备粮结构布局，创新完善重要农产品市场调控，加强现代仓储物流设施建设，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收储调控能力和水平。努力减少粮食生产、仓储、运输、加工、消费等环节损失和浪费。

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农业现代化的主线和重要路径。根据市场供需变化和区域比较优势，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区域布局和产品结构，调优品质、调高质量、调出效益。稳步优化种植结构，建好9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2.38亿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加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推进优质粮食工程，优质耕地优先种粮，发展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巩固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西北风沙干旱区及西南石漠化区等“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成果，稳定优势区玉米面积，提升大豆单产，发展优质饲草料。推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抓好草食畜牧业发展和奶业振兴，推进水产健康养殖。发展农业标准化生产，打造一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特色产品品牌，完善全链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完善的设施装备、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聚焦生物育种、农机装备、绿色投入品等，布局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重大科学设施装置，突破一批关键核心和“卡脖子”

技术。构建多元互补、高效协同的农技推广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产学研用企深度融合。培育推广优良品种，推进农作物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加快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高效设施农业，健全病虫害和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推动农业节本增效提质。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步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抓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打造规模适度、生产集约、效益明显的家庭农场，提升农民合作社规范化水平和服务带动能力，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立足“大国小农”国情农情，发展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统防统治等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是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潜力所在。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综合布局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服务业，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坚持粮头食尾、农头工尾，推进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发展分等分级和高效物流。支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强镇、产业园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满足乡村产业合理用地需求，发展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全产业链提升农业竞争力。

扎实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绿色是农业的本色。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持续推进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发展节水农业，提升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用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加强耕地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健全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好东北黑土地。实施农业绿色发展行动，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建设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引领农业可持续发展。

健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既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也要完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政府规划引导、宏观调控、支持保护等作用。

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十四五”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摆上重要位置，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来抓。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向农村汇聚。落实好“米袋子”省长责任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和生猪生产省负总责要求，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对农业给予保护，是国际通行做法。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出发点，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财政对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持、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稳妥改革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加快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政策精准性、指向性和实效性。加大金融保险支持力度，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模式，推

把“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占斌 杜庆昊

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被首次提及。供给和需求是构成市场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没有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没有需求侧的消费需求牵引，

供给也无法实现。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把“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是大势所趋。近年来，我们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但受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国内市场需求被压抑。在全球经济迟迟无法复

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强化农村人才支撑。围绕“谁来种地”“谁来振兴乡村”，坚持本地培养和引进输入相结合，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抓好农业职业教育，培育家庭农（牧）场主和合作社经理人，培养现代农民和乡土人才。鼓励引导企业员工、大学生、复转军人、返乡农民工、科技人员、执业兽医等到农村创新创业，为农业现代化增添新活力。

加强农业法治保障。抓紧制定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乡村振兴促进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法律法规，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等修订完善，构建完备的农业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深入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加强农业资源环

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执法监管，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行为，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农业健康发展。

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农业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支持建设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基地，巩固果蔬、茶叶、水产等出口产业优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业交流合作，拓展重要农产品多元进口渠道。加强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和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支持国内大型农业企业走出去，培育打造国际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

（来源：《人民日报》2020年12月28日）

苏、外部市场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内需市场，成为当前和今后必须坚持的战略基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要求。

“需求侧管理”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抉择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建强国内消费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点。当前，我国消费率偏低，消费呈现疲软态势。2019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5.4%，虽比几年前有所提高，但仍大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80%的水平，也显著低于我国改革开放后、2000年以前的平均63%的水平。2020年以来，受疫情冲击，居民消费更加疲软，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仅增长0.6%，而人均消费实际下降了6.6%。实施需求侧管理，有助于提振消费，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发展大国经济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大国经济的最大优势是内需拉动、内部可循环。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蕴含巨大增长空间。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这次疫情是一次实战状态下的压力测试，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的动员组织和产业转换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既显示出多年来培育内需市场的成效，也显示出畅通内循环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全面构建比较稳固的现代农业、发达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级装备制造业以及门类

齐全的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门类的完备和产业结构的高端化。这些都离不开内需的支撑，离不开消费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需要。供给和需求总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一个能够自发和及时实现供求平衡的市场，是健康和高效率的市场。近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成效，有效激发和激活了市场需求，也催生和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真正形成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良好局面。但由于国内循环体系尚存在很多短板，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堵点尚未完全打通，在需求牵引供给、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方面还有很多不足。注重需求侧管理，就是要在需求牵引供给方面做出更积极的努力。

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和国内外风险挑战的需要。总的来看，疫情对供给的冲击小于对需求的冲击。因为疫情，很多企业停工停产，居民就业和收入受到较大影响。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又加重了居民谨慎消费的心理。央行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住户存款增加9.95万亿元，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3.9%、实际增长0.6%的情况下，住户存款增加值反而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16.7%，显示出居民对经济发展信心不足。此外，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疫情导致的逆全球化等衍生风险日趋显现。在此情况下提出需求侧管理，是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沉着应变、因时而变、主动求变的战略选择。

“需求侧管理”应牢牢把握的原则和方向

把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是我国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

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长期增长动力。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侧，宏观调控侧重于解决总量性问题，通过需求牵引供给，增加经济总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周期性、总量性问题虽然也有，但结构性问题更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宏观调控侧重于解决结构性问题和供给侧问题，以切实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运行面临的情况比较复杂，既要坚持解决结构性问题不动摇，又要实现经济维持在一定增速水平上的高质量发展，把解决总量性问题摆到重要位置，需要我们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不动摇的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有效结合起来。

把需求侧管理与长期性制度安排有机结合。我国对总需求的管理历经扩大内需、稳定总需求、需求侧管理等阶段。在扩大内需、稳定总需求的时期，多是通过调整短期需求管理工具，达到扩充总需求的目的。与以往不同，当前提出的需求侧管理，是聚焦制约总需求增长的中长期、系统性问题，致力于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强调扩大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消费在国内需求中的比重；注重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坚持扩大开放，提高双循环的畅通性，等等。为此，必须及时启动中长期、涉及制度变迁的需求侧管理工作，以缓解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长短错配问题，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

平实现整体跃升，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把需求侧管理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机结合。需求侧管理的本质是合理扩大需求，促进消费，寻找内生动力。从短期看，促进消费最根本的举措在于促进就业；从长期看，促进消费最根本的举措在于提高居民收入以及缩小收入差距。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30%；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约有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40%。总的来看，中低收入群体还比较庞大，对消费增长具有制约作用。此外，疫情给一些生活性服务业带来较大冲击，这些行业从业人员就业和收入受到较大影响，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因此，实施需求侧管理必须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推进共同富裕结合起来。

把需求侧管理与新发展理念有机结合。需求侧管理不是简单的扩大需求，而是要在激活潜在需求、释放新需求的同时，注重需求质量的提高，通过高质量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核心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一方面，引导社会消费聚焦高科技产品、新型服务业，以此带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攻关，带动前沿技术、颠覆式技术的发展应用，带动高端制造、新型服务业等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另一方面，坚持绿色消费，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通过制度性安排，引导消费向低碳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需求侧管理”的主要领域和举措

合理引导消费、储蓄和投资，形成有效制度安排，形成强大国内市场。2020年下半年以来，投资增速已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居民储

蓄增速很快，但消费增速远低于预期。加强需求侧管理，处理好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关系，有效释放潜在消费需求，对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至关重要。一方面，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引导居民适当扩大消费，降低储蓄率，确保储蓄率维持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根据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趋势，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实施精准投资、有效投资。

积极促进就业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需求侧管理的目的是扩大消费，根本途径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关键举措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是以更大力度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深入挖掘各类市场主体的用工需求，加快释放就业岗位；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力度；鼓励平台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新型就业形态；强化民生兜底保障，将困难群众按规定纳入政策保障和就业援助范围。二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和就业中的身份、性别歧视；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建立符合教育、医疗等各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激发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力；加大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转移支付力度。三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问题。坚持房住不炒，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保持投资适度合理增长，发挥投资对优化结构的关键作用。加强需求侧管理的手段之一就是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政府支出是撬动社会投资的重要支点。一方面要发挥中

央预算投资、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领域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扩大内需增长空间，激活民间投资；另一方面，有效推动社会投资，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足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释放乡村消费潜力；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快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降低社会流通总成本。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消费提质升级。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供需精准对接，有利于为经济转型升级开辟新路径，也有利于开拓新的消费空间。一是大力发展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社区团购、无接触式消费等新消费形态，打造新业态和新的消费热点；二是着力发展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既有利于稳增长、稳投资，也有利于消费升级。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如果没有统一的市场，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很难为内循环形成支撑，也很难把内循环和外循环连接起来。为此，一方面要坚决破除制约一体化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建立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形成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市场；另一方面，要继续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投资规则对接，积极稳妥扩大外需。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01月05日）

加强“需求侧管理”的重点和方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王一鸣

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从供给端发力，也要从需求端着手。注重需求侧管理，要把短期政策调节和中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在有效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更加重视扩大消费需求，着力打通堵点，畅通循环，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注重“需求侧管理”，把短期政策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注重需求侧管理，主要是针对制约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结构性问题，以体制机制建设和相关政策调节为主要途径，打通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和梗阻，有效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这里的需求侧管理，不再仅着眼于逆周期调节，以短期宏观政策为工具，调节需求总量，熨平经济周期，而是更加注重完善体制

机制，更有效挖掘内需潜力，把潜在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激发出来，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从我国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看，主要是通过短期宏观政策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亚洲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大幅收缩，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提出扩大内需战略，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扭转投资快速下降势头，对冲外需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出口和工业生产大幅回落，就业压力明显增大。我国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年新增4万亿元投资，并启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同时采取家电下乡等举措以扩大消费需求。

在这两次应对外部冲击的过程中，短期宏观政策对扩大内需和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产生了重要作用。但仅依靠短期政策调整，难以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还会带来后期政策消化的压力。比如，通过短期政策促进产业投资，在

遏制工业下滑的同时，也会增大后期产能过剩压力，鼓励汽车消费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刺激当期消费的同时，也会透支后期消费。更重要的，随着发展阶段和条件的变化，依靠财政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投资的边际效率会下降，还会增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潜在风险。可见，注重需求侧管理，既要重视短期政策调节的作用，更要重视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建设，把短期政策调整和中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形成释放内需潜力的可持续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按照“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善了供求关系。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率先实现经济“V”型反弹。面对外部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的变化，我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不搞大水漫灌，在采取适度的规模性政策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同时，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从制度建设层面推动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因此，注重需求侧管理，要着眼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基礎上，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持续有效释放

内需潜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需求侧管理”更加重视扩大消费需求

过去一个时期，我国需求侧管理主要着眼于调节投资需求，通过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形成了比较行之有效的投资调控体系，但针对扩大消费需求的调控手段相对有限。随着我国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依靠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明显收窄。2015年以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定在60%左右，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65.9%和57.8%，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分别高24.4和26.6个百分点，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明显下降，从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驱动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020年以来，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但经济恢复仍不平衡，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消费恢复滞后于投资。2020年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下降4.8%，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6%，消费增速比投资增速低7.4个百分点。出现这种情况，既有疫情冲击因素，也有多重深层次原因。

首先，疫情抑制消费倾向和未来预期。受疫情冲击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等影响，居民消费倾向明显下降，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0.6%，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下降6.6%。在收入增长放缓的情况下，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增加近10万亿元，明显高于过去3年前三季度

新增存款平均 6.2 万亿元的水平。究其原因，除了服务消费尚未完全恢复带来的被动性储蓄增加外，主要是预防性储蓄增加的结果。

其次，居民负债水平上升挤出消费。近年来，居民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2020 年上半年，购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5.7%，居民部门负债水平继续上升。居民部门负债水平上升，往往伴随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回落，对最终消费会形成挤出效应。

消费恢复滞后，最终将传导到生产和投资，影响经济稳定复苏。消费恢复滞后于生产恢复，库存就会增加，企业营收也会受到影响。在外需不确定性增加、投资仍受到制造业和民间投资恢复偏慢制约的情况下，推动经济稳定复苏，应更加注重扩大消费。

近年来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呈现一系列新趋势，正在成为推动消费的重要力量。一是商品消费高端化。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对产品质量、品质、品牌的需求日益提升，时尚、品质、节能、智能等升级类产品受到市场欢迎。二是消费结构服务化。实物消费占主导的消费结构日益转向服务消费占主导的消费结构。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 45.9%。通信服务、大众餐饮、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生等服务消费正在成为消费新热点。三是消费方式网络化。随着移动支付普及率快速提升，网络零售全方位融入居民生活，网络消费规模持续扩大。2020 年前

11 个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5.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 25%。四是消费群体年轻化。我国“90 后”“00 后”新一代消费群体，成长于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不同于上一代，相较于价格，他们更看重质量和性价比，追求时尚和品牌，乐于尝试新鲜事物，成为催生新型消费的主力军。五是城乡市场融合化。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网络覆盖范围扩大，特别是国家对农村地区网络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网上零售持续向农村下沉延伸，改善了农村的消费环境。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更加有效连接起来，优质农产品通过网上销售进入城市千家万户，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扩大消费，要适应消费变革和结构升级的新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持续增强社会再生产的循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需求侧管理”要着力打通堵点和畅通循环

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中，消费是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加快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着力点。2019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41.2 万亿元，约为 6 万亿美元，接近美国 6.2 万亿美元的规模，2020 年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零售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显现。加强需求侧管理，重在采取有效措施，打通堵点，在合理引导消费、储

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第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逐步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大划转部分国有资本收益充实社保基金的力度。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和大病保险制度，加快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制度。简化社保参与、转移、接续等手续，加快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

第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是购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军，是引领消费结构升级的中坚力量，对于扩大消费有强大支撑作用。必须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其成为扩大消费的主力军。

第四，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国 2.9

亿农民工已经占到 4.2 亿城镇就业总人口的近 70%，但农民工进城落户仍面临不少门槛。有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 27%。为此，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

第五，坚持“房住不炒”政策。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长租房政策，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监管，严控信贷资金过多流向房地产市场，降低高房价和居民高杠杆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第六，鼓励发展新型消费。加快培育网上零售、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促进新型消费扩容提质。顺应新型消费发展趋势，加快出台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领域相关配套规章制度，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构建良好的消费环境。

第七，鼓励扩大有效投资。继续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设备更新。解决社会投资回报率低的问题，着力提高投资效率，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来源：《光明日报》2021 年 01 月 05 日）

加强系统思维谋划和做好经济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马援 刘伟

20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极不平凡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奋勇拼搏，防控疫情、稳定经济、发展民生，使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总揽全局、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密不可分。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系统工作非常重要。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系统观念，确保“十四五”开好局。在此过程中，要不断增强前瞻意识，加强战略性谋划；要增强全局意识，加强整体性把握；要提高风险意识，解决关键性问题。

增强前瞻意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性谋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前瞻性、战略性谋划，是提升经济工作系统性的前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局势、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 challenge，做好我国经济工作，更要对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做好前瞻和谋划。

第一，要从应对和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长期战略角度来认识做好经济工作的目标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就是要应对和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要在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中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靠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依靠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依靠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依靠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依靠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持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二，要从培育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角度来看待做好经济工作的关键和要点。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才红利初步显现。为此，必须重点培育科技和人才，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当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未来我国面临西方科技制裁

的风险较高，必须强化我国芯片、人工智能、5G、大数据、量子技术、航空航天等应用型战略科技力量，充实数学、物理、材料科学、生物医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力量，推动政府、军队、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五路大军协同共进，发挥政府和军队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下的科技引领作用，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科技人才培养中的孵化器作用，通过中国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第三，要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认识做好经济工作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规划《建议》对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更加完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上述规划和安排，将为未来一段时期做好我国经济工作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增强全局意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整体性把握

全局思维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维方式，是提高经济工作系统性的思想前提。党的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善于观大势、谋大事，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经济系统涉及我国各个方面，要有全局意识，做到整体性把握，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五大关系。

第一，处理好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国内大循环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没有强大的国内市场就没有参与国际竞争、赢得国际市场的条件。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出路，广阔的全球市场是中国制造施展拳脚的舞台。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要充分参与全球市场，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与全球共享发展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使中国经济实现高层次发展。

第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政府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水平，把握好边界。通过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让市场在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市场发展要遵守政策、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第三，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和劳动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中高速时期，尤其要注意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的平衡。在以金融、互联网等为代表的部分行业，已经出现明显的资本与劳动收入差异，甚至部分资本已经通过诱导负债的方式提前透支了劳动者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收入。为此，要通过妥善的方式重新建立资本和劳动平衡，适当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保护劳动者权益，划定资本的投资红线，重点防范通过金融手段透支劳动者未来收益的行为。

第四，处理好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硬币的两面，双方统一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破除阻碍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因素，才能满足高水平需求。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才能让消费者享受更高水平的商品和服务。需求侧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和支撑。唯有强大的国内需求，才能激励企业主动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通过“货币投票”的方式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五，处理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我们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有较大差距，要继续坚持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通过经济支持、人员交流、产业链内移等多种方式，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先富带后富”不是劫富济贫，更不是阻碍发达地区发展，而是利用发达地区积累的资本、人才和制度优势反哺欠发达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提高风险意识，解决经济工作中的关键性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更要注意经济的稳定性。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工作，保证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要特别注意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消除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障碍和问题。

一是控疫情、保安全。尽管我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从全球来看疫情远未结束。为此，应继续保持高强度疫情防

控状态，防范人员大范围密集流动，做好疫情期间的春运各项准备，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只有疫情防控工作有效，才能为经济工作消除最大的风险障碍。

二是促就业、保民生。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20年以来，受到疫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国内外有效需求不足，中小微企业困难较多。在疫情防控形势仍很严峻的形势下，必须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促就业、保民生，尤其是优先保障低收入群体就业。要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技术、政策等多方面援助。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多渠道促进就业，开放公益性就业岗位，保障农民工就业渠道通畅，为下岗再就业提供培训和服务保障。

三是防风险、保金融。由于全球疫情肆虐导致各国经济出现巨幅下滑，国家财政面临严重缩水，由此引发的财政危机甚至经济危机有可能席卷全球。为此，要防范输入性经济危机风险，练好内功，增强我国经济对危机的抵御能力。管好货币总闸门，持续推进结构性去杠杆。要重视宏观杠杆率，尤其是私人部门杠杆率，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妥善处置银行等金融机构违约风险，全面治理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保证中国金融系统稳定。

四是稳地方、保基层。受疫情影响，地方发展遇到一定挑战。疫情期间为稳定经济，地方政府增加了公共财政支出，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为此，要积极采取措施，开源节流，通过提高地方财政留用比例、增加向地方转移支付、中央担保发行疫情专用地方债等方式稳定地方财政，确保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01月11日）

不断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卫志民

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于松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关乎国运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农业基础非常薄弱的条件下，依靠自身力量成功实现了谷物供应基本自给，居民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粮食安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裕，市场稳定，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但粮食安全的基础仍不稳固，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供求在未来还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加剧，世界粮食安全形势空前严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

新粮食安全观，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对于切实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加强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扎实推进藏粮于地战略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通过粮食生产的科学化和规模化实现化肥减量提效，农药减量控害，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在不损害农民权益的前提下推广耕地休养制度，有效恢复、维持和提高耕地质量，切实保障粮食生产的物质资源基础。

另一方面，严格遵守耕地利用的优先次序，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避免以经济效益片面决定耕地用途的土地利用模式。通过健全永久基本农田管理机制与合理规划粮食生产功能区，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产量、质量的稳定性，防止出现耕地利用的非粮化，有效保障和增强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

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有效降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交易费用，打通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性障碍，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化经营，为培育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

推动完善粮食生产支持保护制度

粮食生产支持保护制度是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我国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的背景下，加快形成以财政支持、金融支持、政策支持为主的粮食生产支持保护制度，对于提高种粮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切实提升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通过财政保障性资金的稳定投入，充分发挥财政对粮食生产的促进和支持作用。利用财政资金加快农业基础水利设施、气象灾害预警设施建设，为粮食的规模化生产提供有利的外部基础，以降低粮食的耕种成本，减少种粮主体的资金投入负担。通过合理设置农药、化肥、现代化农用器械等生产要素的财政补贴价格，构建以环境友好、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粮食价格补贴体系，充分发挥补贴资金的引导作用，为种粮主体采用现代化的粮食生产方式提供制度性激励，促进粮食生产从传统方式向集约化、智慧化转变。

其次，创新粮食产业的金融服务模式，加强金融行业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依托不断完善的粮食产业信贷担保体系，充分发挥农村

小额信贷、农业保险等金融服务对粮食生产的支持作用，加快形成以财政保障为主、以金融支持为辅的双重保障格局。

最后，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切实保护种粮主体的合法权益。积极推动粮食安全保障立法工作，形成以粮食安全为导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执法和监督力度，保障粮食产业的健康发展。

加快构建节粮减损长效机制

通过建立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减少粮食收割、物流和生产环节的耗损率，杜绝食品消费中的铺张浪费现象，是健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广低损耗、高效率的粮食收割方式，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机械作业的精细化水平，降低粮食生产过程中的耗损率。推广现代化的粮食运输、储藏模式，加快建立智能化的粮食运输与仓储设施，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粮食运输和仓储过程的信息化与可视化管理，提升全链条的智能化监管水平以降低运输与仓储环节的耗损率。切实解决粮油过度加工问题，提高成品粮出品率和副产物综合利用率。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大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的支持和相关技术的研发推广力度。加强国情教育和粮食安全教育，加大反对食品浪费的宣传教育力度，营造以节约粮食为荣、浪费粮食为耻的社会氛围，培养科学、文明的饮食文化。餐饮企业应转变经营理念，切实履行提醒义务，鼓励消费者适量点餐，在菜品分量上提供多样化选择，推行健康、文明的餐饮消费模式。积极推进

节约粮食、反对食品浪费工作的法治化进程，加快推进粮食立法进程，建立有利于促进粮食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法律机制。

强化粮食生产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耕地有限，技术进步无限，“藏粮于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已经到了更多依靠农业科技进步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统筹兼顾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提质的贡献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实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新阶段。

通过构建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内的多元化研发体系，强化农业基础研究，全面升级农业应用技术，强化生物育种科技创新，着重突破一批影响作物单产提高、品质提升、效益增加、环境改善的关键核心和“卡脖子”技术。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鼓励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通过协同创新开展农用机械研发，推进农业领域产学研融合发展。

加强粮食生产中的科技和人才投入，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落实“藏粮于技”战略的必然要求。不断完善农业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农业知识体系中农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内容，依托高校特色农业学科培养一批既具有扎实农业理论和实践经验，又熟知家庭农场及农业合作社管理经营模式的现代农业人才，为粮食的规模化经营与生产提供充足人才储备。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实现科研人员、农业专家与种粮农户之间的精准对接。积极开展线上农业教育和远程农业指导，充分发挥高

端人才对粮食生产的支撑作用。

适度开展粮食进口贸易

粮食适度进口，是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优化粮食供给结构，从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努力构建粮食对外开放新格局，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已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标。但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进口粮食，在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开展粮食进口贸易，不仅是现阶段优化粮食消费结构、提升粮食供应能力的有效举措，也是健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方式。

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适度进口粮食，提升国内粮食供应和保障能力，满足国内消费者多样化的粮食需求，有效缓解国内粮食生产带来的环境、耕地等自然资源压力；另一方面，开展粮食进口贸易应坚持底线思维，进口粮食不能对国内粮食市场造成冲击，不能挫伤种粮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不能损害种粮主体的经济利益。推动粮食进口国别和渠道的多元化，消除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国内粮食供给的冲击；加强粮食进口的配额管理，严厉打击粮食走私，规范市场秩序，确保粮食产业安全；增强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引导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粮食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易的跨国经营，积极参与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管理，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中的话语权，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01月12日）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韩保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 2021 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我们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要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两个大局，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打造发展新优势，开辟发展新境界。

“十四五”时期对外开放为何强调“高水平”

“十四五”时期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符合历史逻辑，顺乎时代潮流。

其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呈现出“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演化，国际环境日趋严峻复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了一系列新特征新要求，当前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同时，我国制度优势显

著、物质基础雄厚、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并没有改变，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并没有改变。为了更好地以“不变”应“万变”，在变局中开新局，必须更加注重用好对外开放这个“关键一招”，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领域、空间和层次，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从而进一步提高我们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事业的顺利推进。

其二，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居民恩格尔系数达到28.2%，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为此，拓展对外开放领域，增加医疗、教育、能源、高科技等方面的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其三，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

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毋庸置疑，在“十四五”和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扩大，大国博弈将更加激烈，世界经济的大海会更加风高浪急，我们遇到的国家安全风险和挑战必将更加严峻复杂。在这种情形下，统筹发展和安全最好的选择就是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更大的勇气、更强的能力继续到世界经济的大海中去游泳并增强游泳技能，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一方面，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坚决维护多边体制和贸易自由化，团结维护世界和平的进步力量，在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斗争中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要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四，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追求一枝独秀，不搞你输我赢，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而要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实现相互促进，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唯一

路径。一方面，“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另一方面，“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内涵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这三个“更”上下功夫。

“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就是指对外开放的“空间范围”更加扩大。不仅要过去注重沿海、沿江、沿边的对外开放转向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全境对外开放，把自贸试验区、自由港等对外开放高地的改革经验复制到全国，实现对内对外“双向开放”，而且要从主要重视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转向对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元性、全球性对外开放，从而全方位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加快构建我国的全球利益分布格局。

“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不仅是指产业和技术领域要进一步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在继续扩大制造业、采掘业、农业领域的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重视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在更多领域取消外资占比限制，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而且是指从过去重视“引进来”，最大限度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转向“引

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既重视引进国外企业直接投资又重视我国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

“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一方面体现在从过去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假冒伪劣和侵权行为的查处力度，健全外企投诉工作网络，有效维护外商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外资营商环境，确保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通过制度型对外开放，我国将积极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从最终产品竞争转向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竞争，从获取资源转向要素整合、消减隐性贸易壁垒、加快相关体制规制与政策的调整，实现贸易由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促进国内外资本、技术、信息、人力资源、服务的自由流动，促进国内外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要从过去被动的“规制跟随”型开放转向主动的“规则制定”型开放，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逐步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为此，一方面要通过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议程，进一步扩大多边合作范围，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另一方面，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这个平台向国际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让更多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便车”，让中国

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多管齐下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外贸管理体制，在政府职能转变、贸易投资、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加快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绿色、开放、廉洁理念，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全保障，促进共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

持续原则，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深化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科技教育合作，促进人文交流。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在坚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前提下，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不断完善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推动相关机制合作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作用，共同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研究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契机，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加快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共同维护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快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尤其要在国际规则尚未形成广泛共识，而我国已经具备参与塑造和引领国际规则能力的领域，如跨境电商、移动支付等领域，加快形成规则体系，为世界规则制定提供“中国方案”。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3日）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新华社评论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明年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排在首位的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在强化创新驱动、推动创新发展上更加突出战略性、协同性和针对性，更鲜明地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坚实支撑。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把建设一支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的“国家队”作为科技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从嫦娥五号“上九天”，到“奋斗者”号“下五洋”，从量子计算挺进科学前沿，到疫苗研发为人民健康安全织牢“保护网”，从基础研究到高新应用技术研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了使命担当。进入新发展阶段，无论是应对国际经济技术竞争格局的深刻变革，还是催生发展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顶层设计是前提。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就必须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努力抢占科技创新战略制高点，将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打造面向未来的发展新优势。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工作布局是关键。科技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各方力量协同发力。要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进科研院所、高校力量的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让各类创新主体进一步释放创新潜能。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破解“卡脖子”问题夯实根基。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深化改革创新是动力。当前，我国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

以“四个结合”力促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盛朝迅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这既是落实“六稳”“六保”工作的具体要求，也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要推动补短板和锻长板相结合、“点式突破”与“链式协同”相结合、企业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安全可控与开放创新相结合，加快构建新时代产业基础能力体系，打造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

量发展要求，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打破瓶颈制约，必须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落实好攻关任务“揭榜挂帅”等机制，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营造良好氛围，引导科研人员专心致志、扎实进取，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要加快国内人才培养，使更多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链。

首先，推动补短板与锻长板相结合。从短期看，要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聚焦并明确工程重点，调动部门、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力量，力争3年至5年初步缓解产业基础薄弱问题，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重点是“补短板”和应对当前亟须。从长远看，要推动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产业质量水平整体提升，促进一批能

中国的科技创新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科技进步也越来越需要中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绝不意味着关起门来封闭地搞，而是要在开放合作、交流互鉴中求创新。面向未来，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在开放条件下促进科技能力提升，中国将与各国携手推进科技创新、共享创新成果，为全球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不断作出新贡献。

（来源：澎湃新闻 2020 年 12 月 24 日）

够助力高质量发展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产业基础技术和产品突破，搞出更多独门绝技，形成引领未来发展的产业基础优势和反制“卡脖子”约束的制衡能力，重点是“锻长板”“拓优势”。

其次，坚持点式突破与链式创新相结合。产业基础的提升，不能仅仅满足于产业技术“点”上突破，更重要的是解决国产化技术和产品不愿用、不敢用的问题，全面夯实产业基础能力，再造有利于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的制度和环境基础，推进“点式突破”与“链式协同”相结合。为此，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推动全产业链基础能力提升。一方面，通过强化技术创新和集中力量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一方面，要以重点产品为龙头进行“全产业链持续创新能力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产品设计、材料开发、工艺开发、装备制造、示范应用推广等企业和研发机构、高校等单位开展协同攻关，构建国产首台（套）、首批次产品大规模市场应用的生态系统，推动产业基础能力链式突破，一条龙发展。

再次，坚持企业主体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一方面，充分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好企业和企业家作用，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有效发挥国有企业在攻克“卡脖子”问题和补短板中的作用，更好发挥民营企业、在华外资企业和广大中

小企业作用，引导企业突出主业，专注细分市场，掌握独门绝技，成为产业基础再造和资源要素集聚的主体，依靠市场机制来识别产业基础再造中的机会，发现和抓住真正的机遇。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引导，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科技研发等政策，加快培育技术、人才、数据等各类要素市场，构建支撑产业基础发展的基础性平台和基础设施，优化产业基础领域发展环境，完善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引导要素资源向产业基础领域有序流动，形成有利于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的产业生态。

最后，坚持安全可控与开放创新相结合。在推进产业链现代化过程中要辩证看待供应链安全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关系。夯实产业基础、完善产业链条，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形成自主发展能力。同时，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发挥外资企业技术、管理和全球经营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内外资企业合力，共同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对境内各类企业实施同等政策，积极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深化国际产业技术合作交流，拓展专业化全球化市场空间，构建基础领域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0年12月29日）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臧跃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明年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

扩大内需的目的和落脚点在于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已达1.4亿，位居世界第一。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壮大，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动力将更为强劲。中国还有一定比例低收入人口，未来推进高质量发展将大大改善他们的收入水平，其基本需求和潜在需求将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所带来的消费空间和消费能力提升也将远超预期。为此，要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提高投资精

准度和有效性，完善激励社会资本参与机制，更好地支撑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稳定消费预期。

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扩大内需规模与提升品质并重。从实际消费水平来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突破40万亿元，即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但是，中国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仍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服务消费水平未来还有很大拓展空间。从消费支出规模来看，国内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市场潜力需要进一步释放。从消费环境看，随着本土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以及消费相关市场基础设施升级和竞争秩序的进一步改善，尤其是后疫情时代新型消费加速兴起，海外消费回流的潜力也很大。

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保障机制。要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合理增加公共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问题 推动双循环高质量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治理

研究院教授 陈杰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布的公报中，有专门一节提到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一方面体现了中央对民生福祉越来越高的重视，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理念的体现与落实；另一方面也是当

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缓解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迅速上升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减轻居民家庭消费的后顾之忧，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意愿。要继续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与人直接有关的“两个比重”，即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和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市民化质量，加速消费潜力释

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首先，“安居才能乐业”。住房不稳不安心，就难以安心工作，也不敢放心大胆地消费。房价一直上扬，会挤出消费；内需不

放，增强内需动能。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要继续放宽市场准入，提供需求结构升级所需的特别是与扩大服务消费相关的制度供给，推动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改革，提供满足多层次多元化需求的制度保障。要创新和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坚决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建立健全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监管体制，显著提升国内市场监管能力和水平。

（来源：《潇湘晨报》2020年12月23日）

振，内循环就难以顺畅。其次，住房市场仍然是主要风险点，租赁市场构成新的风险点。当前国内投资旺盛、信贷宽松，同时与国外经济萎缩形成鲜明对照，会引发国内外大量热钱进入国内楼市股市，抬高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造成房价泡沫化，形成很大的金融风险。再次，住房消费本身也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足住房消费，既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强社会凝聚力，也直接带动一大批产业发展。最后，租赁住房优先发展，是考虑我国住房发展新阶段特征和服务新型城镇化攻坚的战略布置。目前我国住房的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还存在结构性失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流动人口、新市民的住房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直接制约了他们的劳动产出和消费倾向。在住房供地中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加快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是化解以上矛盾的重要入手点。综合以上角度，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整顿租赁市场秩序，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租赁住房发展，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重要结合点。

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保民生与稳增长需要并重，消减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为要务，住房是完成这些任务的重要切入点。

一要高度防范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引发金融风险。在大城市中心城区继续严格限购限

贷限流转，试点取消期房销售和全面推行现房销售，逐步禁止毛坯交付，全面实现精装修拎包入住式交付。

二要在人口流入多、住房供需存在失衡的大中城市适当加大住房保障覆盖面，尤其要逐步提高对流动人口和新市民提供住房保障的能力。

三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对第二套住房限制流转和开征房产税，在促进合理住房消费的同时，又能做到严格防止房地产投机炒作。

四是土地出让结构调整与城市规划优化相结合，市中心原则上只能建设小户型租赁住房，在郊区可以适度放宽大户型高档住房建设和销售。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上建租赁住房。

五要切实落实鼓励与引导住房租赁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自持型长租公寓发展，给予税费和融资支持，引导住房公积金向自持型长租公寓的建设与运营提供融资支持。

六要提高住房市场治理能力，提升市场治理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各地全面建立住房交易与租赁信息平台。规范房企对购房者、租房者信息数据的收集使用。提高市场监管能力，加强对住房市场包括租赁市场上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调查，提高对房地产企业经营风险的预判能力，提升预警识别能力。

（来源：摘编自《第一财经日报》2020年12月22日）